



导读

- |     |      |
|-----|------|
| 01版 | 国家大局 |
| 02版 | 当代世界 |
| 03版 | 思想理论 |
| 04版 | 社会观察 |
| 05版 | 党的建设 |
| 06版 | 文化教育 |
| 07版 | 军事国防 |
| 08版 | 企业风采 |
| 09版 | 文学艺术 |
| 10版 | 学习纵横 |
| 11版 | 地方发展 |
| 12版 | 参考文摘 |

往期回顾

December 2008						
Sun	Mon	Tue	Wed	Thu	Fri	Sat
30	1 464期	2	3	4	5	6
7	8 465期	9	10	11	12	13
14	15 466期	16	17	18	19	20
21	22 467期	23	24	25	26	27
28	29	30	31	1	2	3

— 梦想成真 发行日

December 2008						
Sun	Mon	Tue	Wed	Thu	Fri	Sat
30	1 245期	2	3	4	5	6
7	8 246期	9	10	11	12 247期	13
14	15	16	17	18	19	20
21	22 248期	23	24	25	26	27
28	29	30	31	1	2	3

二、学校教育与列

《党校教育专刊》



精彩《学校教育专刊》共有四版

- 马恩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 [思想理论] [第467期] [03版] [12/22/2008]
  - “以人为本”的规律论意义 [思想理论] [第467期] [03版] [12/22/2008]
  - 不断吸收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社会主义 [思想理论] [第466期] [03版] [12/15/2008]
  - 如何理解民主与集中相结合 [思想理论] [第466期] [03版] [12/15/2008]
  - 改革开放三十年思想解放的历史进程 [思想理论] [第465期] [03版] [12/8/2008]
  - 继续解放思想的几个着力点 [思想理论] [第465期] [03版] [12/8/2008]
  - 解放思想的三重意义 [思想理论] [第465期] [03版] [12/8/2008]
  - 评《论邓小平》一书 [思想理论] [第464期] [03版] [12/1/2008]
  - 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创新 [思想理论] [第463期] [03版] [11/24/2008]
  - 理论研究要从问题出发 [思想理论] [第463期] [03版] [11/24/2008]

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下一页

 [详细内容](#)

【[打印文章]】 【[放大 缩小]】 【[关闭窗口]】 【[推荐给好友]】

科学认知理论（中国共产党思想史）

《学习时报网》 ( 10/18/2007第 03 版 ) 评论 峰 点击量： 43

候用屏

在《论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》(见本报第275—278期三版)一文中，我曾谈到六个问题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党的理论的研究。在我看来，重视理论研究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特点之一。

无疑，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应当更注重对党的理论的解析。但从思维逻辑着眼，我又觉得，在对党的具体理论进行全面解析之前，倒是有几个关键性问题值得做进一步思考：理论是什么？理论的自身价值何在？究竟需要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理论？这三个问题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具有紧密逻辑联系的整体。

让我们先从中西文化比较入手，梳理一下理论在两种文化中的不同意义。应该说，在中国传统语言文化中，确实不容易找到与英文Theory（我们翻译成理论）能完全对应的涵义的词汇。通常，Theory是特指（根据推理或科学对某一事实或事件的解释，但未经证实）学说、学理、原理（参见《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》，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）。而在中国古代汉语中，理和论一直是分离的。自先秦以来，理在语义上（在理学意义上的理更有其特殊的指向，不在现在的讨论之列）主要指的是治理、文理、条理、顺适，乃至狱官，等等。直到东晋时才开始有了说理的涵义，并侧重于评说（参见《古代汉语词典》，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）。论（通伦，亦有条理之义）在语义上则指的是议论、述说、观点、主张、评定、批决、编撰等（同上）。虽然后来在现代汉语里将理和论加以组合（这大概也是“五四”以后的事情了，详证待考。受西方文化的影响，当时的思想家、知识人使用得更多的词汇是“学理”），像《辞海》里也提到它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，但古代汉语中的特定内涵及其对现代汉语的内在影响（可以比较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解释）却是不能予以忽略的。特别是对Theory中固有的认知推理（假说、逻辑）因素、科学（事实、待证）因素在汉语中的语义上的缺失，我们更是不能视而不见，因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恰恰出在这里，理论实在是很难走出述说层面，走进认知推理层面。这种困境自然也会影响到人们对理论自身内在价值的判断，以及对理论的深入探究，从而也就使得理论很容易流于表面形式，过于世俗化、功利化。刘少奇当年在分析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特点时所特别点到的“理论准备不足”问题与此不无关系，个中缘由颇值得深思。

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周策纵在笔者访学时曾专门与我反复谈到对理论、学理的认知问题，从中切实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所造成的逻辑缺失。由于他强调所谈是自己痛切的感受，故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他说，“我们做学问，固然需要理论。但首先需要理解、需要厘清各自所使用的概念和术语。否则，在跨文化的现代学术背景之下，我们之间便几乎无法开口讲话。”为此，他着重分析了国人轻视精确规范概念和术语的基本原因：“由于读了更多的外语，使我深深感到，从古代起，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免有两个最基本的缺失：一个是逻辑推理不够精密，尤其是在实际议论时不能严密运用‘三段论法’（Syllogism）。另一个缺失看来很简单，却可能更基本，我们对‘认知’的意识不够发达。从先秦起，‘是非’就逐渐变成道德词汇，不是指实之词了。‘是’、‘为’、‘乃’作为指实词，用得很不普遍和明确。汉语动词作名词用自然太多了，可是‘是’作为tobe或being意义用作名词者，恐怕古代并不多见。我只不过用这个例子来说明，我们传统上‘认知’是什么不是什么的意识，发达得可能不充分。这两点是我去国五十年来的痛切感觉，对不对自然是另一个问题，但对我后来的治学研究，关系不小。”

我还联想到已故思想文化史家殷海光，他在反思近代以来东西文化比较问题时也曾经谈到了类似问题，也同样感受到其中有一种隐伏的“痛”。他执着地认为：“中国近六十年来，谈文化问题的人士谈出苗头的实在是少”。“现在，如果有人问我，是西化好还是中化好，是古代好还是现代好，我的答复是：我不知道”。不过，“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内心深处倒有切肤之痛，而且现在仍在切肤之痛中。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。一方面是社会层面。在这一方面，家庭和旧风俗，对我的发展阻力最大，因而我最厌恶中国的‘人事’。另一方面是致知层面。在这一方面，中国人之分不开人事伦范的社会关系和客观的认知判断，使科学的心态不能超然独立。这令我一直深恶痛绝”。他还说，“近几十年来，无论是赞成西化或主张保守中国文化，大体都是从这类个人的利害原因及情绪作用出发的，很少根据文化等等做客观的认知”。他表示自己是一个Nontraditionalist（非传统主义者），虽然“现在仍然受着中国文化的许多扼制，但是我已跳出过去的局格，而对它做客观的体察。就认知的智识（Cognitive knowledge）而言，包括数学与逻辑在内，西方远较东方发达。由这些学识所产生的技术，成为西方‘Power’（船坚炮利）之源”。

显然，从周策纵、殷海光的“痛”中，我们能够体味出的东西是多方面的。单就其对理论而言，就是对“致知”（更严格意义的思考）的真诚与追求。理论的自身内在价值集中体现在认知与逻辑的有机构成上面，致知是最根本的。同时，致知也绝不能离开事实的依据，需要运用指实性思维从事实中进行推衍。我们常说，要达到逻辑和历史的一致，中国古代哲人所竭力倡导的“理在事中”，讲的也都是这个道理。因此，在思想史研究中，这同样亦是最基本的方法论之一。

让我再来举一个政治家的例子。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对辛亥革命的深刻反思中，也同样敏感地意识到理论构成中致知与逻辑的缺失问题。他巧妙地透过中国传统的知行观（即所谓“知之非艰，行之惟艰”），发觉了问题的症结所在。

在孙中山眼中，辛亥革命以后多年的事与初衷完全相悖，“本可从此继进”，但其主张却难“有效而见之实行”。那么，其原因何在？孙中山认为：“吾党之士，于革命宗旨，革命方略，亦难免有信仰不笃，奉行不力之咎也；而其所以然者，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，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。此思想之错误为何？即‘知之非艰，行之惟艰’（引者注：此说出自《尚书》）之说也”。因此，孙中山在《建国方略》中集中分析和批判了所谓的“知易行难”之说。

长期以来，对孙中山在认识论问题上的这种独特看法，学术界对此理解的共识明显有误。很多人甚至认为，孙中山孤立地用难易来识别知与行的关系没有太大的意义（也有人认为是错误的观点）。更重要的是：要正确认识知与行的辩证关系，特别是行的基础作用、认识的来源，以及真理的标准，等等。习惯的说法就是，认识绝不能离开实践，要经过实践的检验。因此，在这里，行是难的，也是最为重要的。

我认为，孙中山的这一认识论主张是有其特殊意义的。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，它尤其突出强调了科学、理论、逻辑推理的重要内在价值，及其对于实际的强有力指导作用。我们经常说理论联系实际，但似乎着重点是放在实际的上面。可是千万不要忘记：理论联系实际，首先要有的是理论（学理）。科学与技术，科学则是基础。孙中山就专门从最实际的生活范例入手，“以饮食为证”（中国有饮食文化闻名于世，但却没有科学意义的医学和营养学）、“以金钱为证”（中国需要理论意义的经济学、金融学）、“以作文为证”（中国虽文字历史悠久，但也更需要文法、逻辑学）来说明科学、理论和逻辑思维的极端重要性。孙中山说，“夫科学者，统系之学也，条理之学也。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。拾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，

多非真知识。”此外，孙中山还一一提到，中国也十分需要建筑之学、工程之学、电学、化学，需要各种学科的相互交叉、相互影响，等等。

其实，无须讳言，科学、理论、逻辑思维和逻辑推理，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缺少积累的东西。这一关键的缺失，的确被孙中山抓准了。这也正是孙中山的伟大过人之处。

因此，对待理论，我们必须要有科学理性的态度，不要人为地给它附加它所不能承受的东西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可以这样设想：如同知识就是知识一样，理论就是理论。要用求真、求知的价值标准客观地认知理论，要真正培育出为知而知的理性精神，从根本上避免对理论的人为的庸俗化。

(作者：侯且岸)

#### 其它相关文章

- 科学认知理论（中国共产党思想史）

[第327期] [03版] [10/18/2007]

#### 发表评论

【[打印文章] [放大 缩小] [关闭窗口] [推荐给好友]】 【发表评论(0)】

现在有 0 人对本文发表评论

[查看所有评论](#)

匿名发表 署名：

学习时报

WWW.STUDYTIMES.COM.CN

[提交](#)

[重填](#)

① 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，不代表学习时报观点！

您是第位访问者

[关于学习时报](#) [关于我们](#) [联系本报](#) [来稿需知](#) [广告发行](#) [内网链接](#)

版权所有 学习时报社 电子邮件：xxsb@263.net 电话：86-10-62805131 京ICP备08102014号

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技术支持：北京博之雅科技有限公司 未经书面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（2007年7月31日）